

「眾聲喧嘩」還是「眾生宣華」？ ——《最後的女王》與華語語系研究*

林 芳 玫**

摘 要

華語語系研究強調語系內部及外部多元語言的眾聲喧嘩，然而近年來經過許多研究者熱心的推動，似乎朝向以單一華語為最大公約數而流失「語系」概念所彰顯的跨文化與跨語言的張力。本文以華語語系研究的視角，探討卑南族作家巴代的原住民歷史小說《最後的女王》所提出的另類史觀。此書描述清朝末年臺東卑南族彪馬社的女性領導人陳達達如何與清朝官府周旋，走過一次次的危機。書中呈現彪馬社原住民與百朗（漢人）商人、清朝官員、鄰近番社、日本顧問間多重權力關係下的互動與協商，顯示彪馬社原住民的策略思考與軍事動員能力。

臺灣歷史學者針對日本殖民時期，特別是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的這段歷史，多以抵抗史觀為主，而巴代提出與漢人抵抗史觀相異的協力史觀。本文從華語語系的觀點，分析原住民作家漢語書寫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與價值。巴代針對甲午戰爭提出原住民的特殊經驗，激發讀者由地方史而連結東亞史與世界史。本文企圖由原住民作家巴代及其書寫，檢視華語語系文學如何成為地方性的文化生產，並與在地的非華語多元語言互動，期能藉此反思原住民文學如何與臺灣的定居型殖民主義對話，促使臺灣的國族文學展開政治倫理的思辯。

關鍵詞：在地文化生產、定居型殖民主義、眾聲喧嘩、華語語系研究、
《最後的女王》

2017.12.12 收稿，2018.06.27 確認刊登，2018.08.01 修訂稿收件。

* 本研究過程中，由師大臺文系博士班邱比特同學協助資料收集與文稿潤飾，並參與修改過程。稿件最後由師大臺文系大學部黃茂善同學校對，在此向兩位同學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眾聲喧嘩」還是「眾生宣華」？

近年來臺灣學界對華語語系研究興起一股熱潮，國內許多期刊推出專輯。¹源於史書美在美國針對中國研究、亞洲研究、亞美研究提出新的視野與研究進路，華語語系研究對臺灣文學的研究也深具啟發意義。除了史書美，王德威也是重要推手，近年來的著作一方面提倡「後遺民寫作」，同時又與華語語系研究對話。華語語系研究提供一個平臺，讓世界各地的華語寫作者與研究者得以互相看見，滿足了國內學者對「與國際接軌」的焦慮與欲求。

然而，在這一波熱潮中，華語語系研究應有的批判與比較視野被稀釋了。筆者認為這個詞彙的中間兩個字「語系」才是重點，不只要看到華語與其他語言如閩南語、客語、粵語的互動關係，²更應探究在每個特定的地方，華語與非華語在當地歷史脈絡下的互動關係。然而在王德威等學者的研究裡，「語系」不見了，只剩單一語言華語（臺灣的國語／中國的普通話），以華語為「最大公約數」，³不同地方、不同國家的華語書寫被涵攝在此框架，同時以中國知名作家來引介非中國作家，⁴隱然把華語當成吸星大法，全部統攝於「中國文學」的大傘，以此證成中國文學的多元與異質性，抹除各地方的特殊性，否認文學生產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重要關連。單一的華語又和華人連結，形成「眾生宣華」，有如多年前杜維明「文化中國」的當代版。

這樣的作法與史書美所倡導的「少數與少數的連結」、「華語與其他華語的關係」、「華語與非華語的關係」、「華語的在地文化生產與文化混雜」在觀點、方法與批判效應上完全不同。史書美所強調的「眾聲喧嘩」不只是文學書寫內容多元性的比喻，更是很直接的反映各種語言混雜後口說語

¹ 如許多期刊的專輯：《中國現代文學》第 32 期「華語語系研究」、《中外文學》44 卷 1 期「華語與漢文專輯」、《中山人文學報》第 35 期「華語語系文學論述」、第 40 期「華語語系表述／馬華文學」等。

² 筆者採用 Victor Mair 的觀點，認為這些語言彼此無法溝通，應視為語言 (languages)，而非「方言」(dialect)。參見 Victor Mai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tonic Papers* 29 (1991), pp. 1-31.

³ 「最大公約數」一詞來自王德威。參見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 (2012)，頁 16。

⁴ 例如視陳映真為「臺灣的魯迅」，馬來西亞華人作家李天葆成了「南洋的張愛玲」。參見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頁 11-37。

在聲音上的南腔北調、東唱西吟。本論文希望藉由華語語系研究、關係的比較學、世界史三個概念來探討卑南族作家巴代的原住民歷史小說《最後的女王》。論文首先提出華語語系的主要論點，其次分析《最後的女王》，最後以關係的比較學及世界史思考這些概念對研究臺灣文學可帶來的啟發。在最後一部分，筆者也以「原住民作為研究方法」與華語語系研究對話。本文除了強調「眾聲喧嘩」，也希望從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眾生宣華」：筆者認為「華」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而是中介過程。我們以特定「地方」及其歷史為起點，經過中國／中華的階段而抵達世界史。以《最後的女王》為例，我們以臺灣臺東卑南族彪馬社的歷史為起點，經過晚清史與東亞史而抵達世界史，而過去的世界史又繼續與現在及未來的地方史持續互動。

二、華語語系研究： 少數與少數的橫向連結與在地文化生產

史書美對華語語系的定義是：在中國與中國性（Chineseness）邊緣的在地華語語系文化生產及其所形成的網絡關係。⁵由於其在地特色，華語勢必與當地非華語互動：⁶如馬來西亞華語與馬來語的互動，或是新加坡這個國家英語、華語、福建話、客家話、淡米爾語、馬來語的並存與互動。每個地方有各自特殊的歷史脈絡，因此華語可能是少數族群的語言，也可能是多數族群的語言。⁷以臺灣而言，國語是強勢主導語言，過半數臺灣人民會講臺灣閩南語，但是臺灣閩南語的地位是多數還是少數，尚未有定論。⁸至於客家話與各原住民族的母語則無庸置疑，為少數與弱勢語言。臺灣當代文學絕大部分以當代白話文書寫，但鄭氏王朝、清朝、日治時期文言文為主要書寫語言，日治時期出現白話文書寫、臺灣話文書寫、日文書寫。日治時期出現臺灣話文運動，開始有人提倡以漢字或羅馬拼音將口說臺語轉變為書寫文。日治時期古典詩即便是使用文言文書寫，在朗讀時以臺語發音。戰後的語言政策獨尊國語，其他語言被降格為「方言」，甚至在校園裡

⁵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4.

⁶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3 (2011), p. 716.

⁷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Leiden: Brill, 2010), p. 39.

⁸ 多數人會講臺語，但臺語不斷流失，年輕人的臺語程度比上一代低落。

禁用方言。解嚴前後本土運動及民主運動的興起帶動原住民運動、母語運動及婦女運動等各種社運，使得原住民開始重視母語的保存，並以羅馬拼音呈現母語。臺灣文學固然有許多標準國語的書寫，但作家為了呈現多語的現實環境，經常在口語部分加入臺語或客語。而巴代本人會講流利的臺語及族語，在《笛鶴》這本小說大量使用漢字表記臺語，以及羅馬拼音的母語，但巴代都將二者翻譯成流暢易懂的華語。在《最後的女王》一書，除了少數卑南族詞彙，全書都用流暢易懂的中文寫成。臺灣文學，特別是臺語文學與原住民文學，成為華語語系研究的最佳案例。

華語語系研究最核心的精神是以「地方」及「空間」所形成的文化生產與每日實踐。⁹如果「地方」與「民族國家」的邊界重疊，也不必刻意淡化民族國家的重要性。¹⁰這樣的想法，在 1980 年代人類學者陳其南就已提出「土著化」論點，與史書美對地方性的看重類似，「土著化」也與歷史學者李國祁「內地化」論點形成鮮明對比。¹¹內地化論點認為清朝晚期臺灣漢人的社會組織越來越類似內地文治社會；土著化論點一方面承認清朝漢人社會組織類似華南，但是居民已經在臺灣這塊土地落地生根，族譜記載「開臺祖」，而「唐山祖」的紀錄變少。

史書美對地方的重視包括原住民的文化及其與外來者的互動關係。如果以「土地」來瞭解「地方」，我們可從史料得知這是持續數世紀的移墾漢人對原住民土地的侵襲占領，形成所謂「定居型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¹²定居型殖民主義是一套結構，而非一連串單一的侵占事件。漢人利用「無主地」的概念，將原住民賴以為生的獵場視為無人耕耘的土地據為己有。¹³

1977 至 1978 年興起的鄉土文學論戰，作家與評論家如葉石濤、陳映真等人都具體的主張臺灣文學應與臺灣的土地與現實結合，有別於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兩種寫作流派。蕭阿勤將主張鄉土文學的陣營視為「回歸現

⁹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pp. 29-48.

¹⁰ 王德威於多篇論文中屢次提及文學與民族國家的脫鉤：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頁 1-18；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

¹¹ 李國祁，〈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內地化的解釋〉，《歷史月刊》第 107 期（1996），頁 58-66；陳其南，〈傳統制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歷史與人類學探索〉（臺北：允晨，1998）。

¹²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 713.

¹³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 713. 史書美，〈理論臺灣初論〉，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臺北：麥田，2016），頁 72。

實」的世代。¹⁴在當時的氛圍下，1950年代官方主導的反共文學與1960年代白先勇透過現代文學此刊物所刊登的現代主義文學各自有其主導性的年代，鄉土文學相對上是弱勢。然而，注重與土地連結的鄉土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發生前看似為弱勢文學，卻忽略了漢人對土地的重視，其實也就是定居者殖民主義的一環。

定居臺灣數百年的漢人，在歷史上與荷蘭人、日本人都扮演侵奪原住民土地的角色。1949年後國民黨政府來臺，持續對原住民採取強迫漢化政策以及徵收原住民土地。原住民漢語文學在早期充滿控訴色彩，¹⁵到了出版於2015年《最後的女王》，全書並無明顯的控訴與抗議色彩，但也屢次由角色對話顯示出百朗對土地的概念是「有土斯有財」，利用土地的買賣或租賃來賺錢，而原住民則是以土地維生，敬畏自然，與土地成為命運共同體。

史書美除了提倡華語語系研究，也致力於從世界史角度來從事文學作品之間的比較，提出所謂「關係的比較學」。¹⁶比較並非將兩種文本並置（juxtaposition），而是探究其動態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文學並非以文本形式靜態的存在，而是以動態方式與權力關係交涉互動。¹⁷臺灣原住民文學能蓬勃發展，與1980年代興起的原住民運動息息相關。¹⁸在本土運動與黨外運動所帶起的反威權及民主化運動，催發了原住民運動、婦女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同志運動、母語（臺語）運動等。就如女性主義思潮及婦女運動與女性自我覺醒後的文學書寫熱潮及女性文學的研究互相呼

¹⁴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¹⁵ 例如：田雅各〈最後的獵人〉暴露漢人警察對原住民獵人的輕視以及警察沒收獵物後，假公濟私拿來自己享用，田敏忠〈出草〉則控訴日治時期殖民政權。參見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最後的獵人》（臺中：晨星，1987），頁45-74；田敏忠（游霸士·撓給赫），〈出草〉，《天狗部落之歌》（臺中：晨星，1995），頁137-169。

¹⁶ 史書美著，楊露遙譯，〈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第39期（2015），頁1-19。

¹⁷ 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頁1-2。針對以動態關係性來研究臺灣文學，李育霖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參見李育霖，〈臺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臺北：書林，2009），頁165-210。關於把文學視為活動，林芳玫曾提出「文學社會學的多重互動模式」，參見林芳玫，〈導論：文學社會學的多重互動模式〉，《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北：臺灣商務，2006），頁1-27。

¹⁸ 參見孫大川，〈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1993），頁97-105；陳芷凡，〈「第三空間」的辯證：再探《野百合之歌》與《笛鶴》之後殖民視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9期（2014），頁115-144。

應，原住民運動也與原住民漢語書寫密切相關。當時的作家往往包括運動者、文史工作者、創作者三種身分，如瓦歷斯·諾幹。千禧年後原運低迷，巴代也不是來自原運，但身為原住民作家，他也必須是文史工作者，而他本人更重視後者身分。¹⁹臺灣女性文學書寫一方面探討個人情慾的壓抑與解放，同時也極力從女性觀點書寫歷史小說，挑戰既有的官方與男性史觀。巴代企圖心更大，近年來密集出版了《笛鶴》等數本歷史小說，展現原住民史觀。²⁰

原住民南島語言的書寫系統有：羅馬字、漢字、片假名、注音符號、國際音標等。²¹巴代在《笛鶴》一書，大量使用漢字臺語及羅馬拼音的卑南語，再以漢語翻譯。這種作法方便讀者閱讀，又保存了不同語言的風味。例如：

“恁攏甲我聽清楚，這款代誌唔攔再發生了。”

「你們給我聽清楚，這種事情不准再發生了。」²²

Ha shu...

Hala demuwamuwan na nayzayan na ·

Daduway gula bendik gula.Yinmuna gahulasan na mazalazam

Ha shu...

哈！噓！

列祖列宗，巫師姊妹

我將招引，我將開始

全能如您，解惑如您

長春如您、全知如您

哈！噓！²³

¹⁹ 參見張耀仁專訪，〈我對文學沒有想像：巴代談《巫旅》〉，《自由時報》(2014.08.18)，副刊，<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805492> (2017.06.03 徵引)。

²⁰ 既然談世界史與關係的比較，也應該從全球的角度比較各國婦女運動與原住民運動。限於篇幅及筆者有限的的能力，此處略過。

²¹ 參見陳芷凡，〈母語與文本解讀的辯證：以魯凱作家奧威尼·卡露斯《野百合之歌》為例〉，《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第6期(2005)，頁199。

²² 巴代，《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臺北：麥田，2007)，頁88。

²³ 巴代，《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頁117-118。

巴代在《笛鶴》一書展現語言實驗的企圖心，也以此書探索女巫文化。到了《最後的女王》，他已不需要證明原住民族的特殊性，轉而以流暢華文書寫。另一方面，此書也鮮少著墨祭典、女巫等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而是以彪馬社觀點與主流臺灣史對話，其中又交織著原漢、原清、漢清、原日、閩客等多重族裔與種族關係。

三、《最後的女王》與彪馬社的多重族群關係

原住民卑南族作家所寫之長篇歷史小說《最後的女王》，以清朝末年到乙未割臺約十年間為歷史背景，描述臺東卑南族彪馬社最後一位女性領導人達達的故事。此書敘事手法樸實簡單，看似平凡，實則融會了大量史料並提出原住民——特別是卑南族彪馬社——特殊的史觀。不同於解嚴以來大量出現的歷史小說將線性時間切割又來回巡弋，此書以直接了當的方式根據編年史順序敘述清末最後十年卑南族彪馬社（以下簡稱彪馬社）的經歷。書中述及事件有些是臺灣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對臺灣及整個東亞局勢有關鍵影響力的甲午戰爭，有些則是一般人不熟悉的原住民歷史，例如1887年（光緒13年）清廷強迫卑南族呂家望社雉髮而引起一觸即發的戰爭氛圍。此書從原住民角度出發，放在族群關係的脈絡下呈現原住民與客家人、閩南人、清朝官員的互動，也觸及早年與荷蘭人的互動及書末出現日本人，小說提供一個舞臺讓不同族群與種族的人登場，而非受限於描寫卑南族單一族群。

本書使用平鋪直敘、線性發展的敘事方式，讓讀者更能清楚感知其歷史內容所包含的多重權力關係及其複雜的糾葛。巴代曾在接受時報記者訪問時說：「我對文學沒有想像」，以此來定位自己的角色是文史工作者而非作家。²⁴他這樣的宣稱，顯然是很瞭解別人（特別是漢人評論家）對文學的想像，而主動棄絕此種狹隘的文學觀。他似乎已經預見了書籍出版後某類評論者會有的反應，因而自己先抗拒此種文學觀。那是怎樣的文學觀呢？「秘密讀者」²⁵對此書長篇的質疑與負面批評的方式恐怕是巴代以前就遇過了。「秘密讀者」認為此書的人物過於平面化，缺乏對人物內心意識的深刻

²⁴ 參見張耀仁專訪，〈我對文學沒有想像：巴代談《巫旅》〉。

²⁵ 「秘密讀者」為一文學評論的部落格，寫評論的人都以匿名方式發表。參見不著撰人，〈以「小說」寫史？——巴代《最後的女王》的小說技術商榷〉，《秘密讀者：輕薄的假象》（2015.09），<http://anonymousreaders.logdown.com/posts/304088>（2017.06.03 徵引）。

挖掘、女主角身為女王在故事中卻看不出什麼積極作為、對情節的鋪陳缺乏細膩的鋪陳與轉折。「秘密讀者」彷彿小說寫作課的老師，詳細敘述小說應該如何寫才正確。巴代及其他原住民就是對這種文學的「標準」與「正確」採取棄絕方式，凸顯自身原住民作家的書寫主體。²⁶此書獨特的「協力」史觀，與主流歷史學者或歷史小說作家截然不同，值得我們省思除了歌頌人民對當權者與殖民者的「抵抗」，如何面對彪馬社一次次對當權者的協力？

（一）從抵抗到協力

不論是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臺灣本土歷史學者，都肯定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後，臺灣人民組成義勇軍壯烈抗日的史實。巴代目的不在於挑戰這種看法，而是另闢途徑，如實寫出彪馬社自荷蘭人統治時期以來，對一次次新政權的協力與輸誠。如此不但可以保存自身部族的基本生存，甚至可以藉機壯大自己彪馬社的實力，稱霸於其他番社。外來政權的力量是遙遠的，可以用來從事槓桿操作而取得鄰近部落的盟主地位。

本書一開始先以「楔子」形式，簡短交代荷蘭人登陸臺東時，彪馬社協助一起去尋找金礦。又於 1642 年（明崇禎 15 年）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一起攻擊臺東平原西側的「大巴六九」部落。之後荷蘭人在卑南平原舉行「地方會議」（1652 年、清順治 9 年），彪馬社趁機掌握平原大部分部落，取代原本最強的「卡日卡蘭」社，成為整個臺東平原的霸主。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彪馬社「以洋制夷」的策略。²⁷巴代經由描述彪馬社與荷蘭人的互動，呈現出荷蘭人作為外來者並非與鐵板一塊的原住民形成直接的上對下統治關係，而是原住民不同部落如何善用合縱連橫彰顯自身主體性。如同人類學者謝世忠分析，起初原住民是島上唯一的主人，荷蘭人來臺後進入第二階段，原住民是「主人之一」，亦即此階段原住民仍是主人。日治時期霧社事件後，原住民成為徹底的被統治者。²⁸巴代所描寫的卑南族，仍是「主人之一」的階段，但當事人也隱約感到即將成為被統治者的未來。

²⁶ 參見瓦歷斯·諾幹，〈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臺北縣：印刻，2003），頁 145。

²⁷ 對荷蘭人而言則是「以夷制夷」。

²⁸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玉山社，2017），頁 29-34。

「楔子」也記載了清朝朱一貴事件與林爽文事件中，彪馬社都協助清軍打敗民變漢人「叛軍」（義軍？），於是 1788 年（乾隆 53 年）林爽文事件平後，「三十餘臺灣的『生番』、『熟番』領導人奉旨晉見乾隆皇帝。除賞賜衣物，筵宴共計在西廠小金殿兩次、重華宮兩次、紫光閣兩次。……進京受賞賜『六品頂戴』，從此，以『拉赫拉』為領導核心的彪馬社，更加堅定的宣稱掌有臺東平原與向北花東縱谷、花東海岸七十餘個部落的管轄仲裁權。」²⁹

簡短交代完這幾次事件，小說第一個出場人物是西露姑女王，其女達達日後也繼承其頭銜為女王。此時的西露姑漢化已深，第一任丈夫來自布農族，第二任丈夫則是漢人番產交易商陳安生。西露姑第一次出場是這樣的：坐在八名部落男性抬的轎子，周邊有配刀女性侍衛數名。而她的服裝更是奇特：

舉手間，緞面黑色布料裁剪的寬大衣袖，搔拂著右臉頰，她忽然沒來由的傷感了起來。

這黑色袍褂，是仿照她曾祖母所珍藏的清朝王妃服飾所裁製而來的！³⁰

西露姑不只是穿著仿清朝王室的穿著、與漢人結婚、也被丈夫陳安生影響而染上吸鴉片的毒癮。一開場巴代描寫的搭乘轎子、發脾氣掌摑男性轎夫的女王其實沒那麼神氣，因為此時她已染毒多年，坐在轎上毒癮發作：流鼻涕、躁熱、噁心，於是急急忙忙趕回「王府」，是一棟漢人式的住宅，一回去就趕緊爬上鴉片床吸食鴉片。小說中許多關於彪馬社未來發展的夫妻談話，大多是夫妻兩人臥在鴉片床上邊吸煙、邊討論。

小說透過西露姑眼光，呈現漢人番產交易商林貴如何漸漸滲透到部落而掌握了實權。西露姑為了鞏固自己的領導權，也與同是漢人番產交易商陳安生結婚。彪馬社因而形成領導上的雙元體制：一邊是部落內經由繼承而成為女王的西露姑及其夫陳安生，另一邊則是林貴，兩邊互相尊重合作。

關於這個漢人混入番社而竄奪原住民財產與權位的現象，19 世紀曾至臺灣遊歷的兩位西方人都曾記載。一位是法裔美籍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的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³¹另一位是英國人必麒麟（William

²⁹ 巴代，《最後的女王》（新北：印刻，2015），頁 8。

³⁰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6-7。

³¹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eds. Douglas L. Fix and

Alexander Pickering) 的 *Pioneering in Formosa*。³²兩人描述此現象都明顯批評漢人巧取豪奪而同情原住民流失財產與領導權。他們指出漢人來到番社後，娶番女為妻，融入番社生活，最後則是把原住民土地巧妙變成自己的土地。在巴代的小說，則用中性的筆觸描寫林貴、陳安生、以及達達的漢人丈夫張新才。陳安生把鴉片癮傳給自己的妻子，而張新才從事的各項買賣也包括鴉片。巴代並未從作者視角或人物視角批評這些人的作為，而是如實寫來，由讀者自己去體會。漢人看似與原住民和諧相處，其實卻是逐漸滲透而掌握實權，顯示出原漢關係和諧又緊張的弔詭。

本書可說是一本戰爭小說，由數次重大危機事件與武裝衝突架構起情節發展。第一次危機是呂家望社的「雉髮事件」。呂家望社同為卑南族，原本臣服於彪馬社，因為不想服從清朝雉髮的命令而意欲抗清，彪馬社從旁觀望，呂家望社與清軍戰爭一觸及發。本書歷次衝突事件一貫的主題：原住民族並無集體的共同利益，而是以自身的「社」為團結單位，為了鞏固社的利益不惜與他社對立或與漢人、與清朝官員同謀。而張新才則關心戰爭對其個人生意與財產的影響，引發達達感嘆「百朗」（漢人）³³凡事以金錢考量，畢竟與部落文化差距甚大。

呂家望事件平安落幕，再來是呂家望與卡地步兩個番社宣戰。彪馬社並未即時得知，過了數天才從路過本社的洋人旅行家得知此事。他們由自己的無知與狀況外，進一步感嘆交戰雙方不把彪馬社看在眼裡，彪馬社已經被邊緣化。³⁴貫串全書的是彪馬社的「黃昏意識」，他們緬懷往日榮光、憂慮部落的未來、間接感知外在局勢迅速的變化及對番社的衝擊、在無力感中仍打起精神來縝密規劃每次的危機、謀定而後動。甲午戰爭結束時，他們在日本人協助下由達達領導，打敗打劫民舍的清朝殘軍。這是達達與彪馬社光榮的一戰，卻也標示清治時期的結束以及爾後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更殘酷的控制。這光榮的一戰，其實也是個結束。本文稍後再對本書描述的甲午戰爭進行細部審視。這些小戰役的累積，顯示原住民從謝世忠所謂第二階段的「主人之一」，逐漸邁向第三階段「徹底被統治」。

John Shufelt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³² 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³³ 原住民稱漢人為「百朗」，源於閩南語的「壞人」(pháinn-làng)。

³⁴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108-112。

1888年，由於清朝官員雷福海徵收稅收手段苛刻，又對不繳稅的民家姦淫其妻女，導致人民起而抗爭。這次抗爭主要由客家人組成，從漢人觀點稱此次為「大庄事件」。客家人在反抗過程中與呂家望社結盟，呂家望社終究是與清軍直接發生武裝衝突。此處卑南族呂家望社與客家人結盟，但這只是單一事件的結盟，顯示出臺灣族群關係的複雜。

這次事件史書上的記載是「大庄事件」，從客家人民變的觀點來指稱此事件。而巴代的小說則稱為「呂家望」事件，顯示從原住民立場來描述客家人民變對不同番社的影響，以及客家人與不同番社間的多重協力關係。呂家望社選擇聲援客家人，因為多年前被強迫雉髮仍使得他們餘怒未消，也顯示呂家望社對自身文化的堅持。彪馬社一如之前發生的種種事件，總是先觀望、保持中立。出身漢人的陳新才很務實的認為跟官府對抗沒好處，若是扮演代理人角色則有利可圖。張新才的思考方式與所扮演角色正是史書美在批判殖民主義時所提到的一種關鍵角色「中間人」及其所代表的中間人殖民主義（middleman colonialism）。³⁵中間人扮演殖民官員與在地土著之間協調溝通的角色，看似具有正面功能，其實都是為了聚斂個人財產與私利，也以長期滲透的方式逐漸侵蝕在地土著的土地與文化傳統。卑南族兩代女性領導人西姑露與達達都與漢人通婚，也讓其夫陳安生與張新才握有實權，以壯大自己彪馬社實力的務實理由，屢次擴張漢人勢力、與鄰近部落關係緊張。

張新才想要與官府合作並趁機對呂家望社落井下石，部落長老略感遲疑：「這……會不會太不道德啊，都是兄弟番社。」³⁶而張新才一番利益分析的冗長言論後，「令達達忽然心生厭惡」³⁷。凡此種種顯示彪馬社並非毫無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自覺，只是不夠積極，且在漢人領導下聽從其建議。作者看似平淡與中性的描述，其實還是迂迴委婉的點出漢人通事以番社之名壯大自己個人的利益，以及原住民的委屈與無奈。彪馬社極力想要成為諸部落的霸主，如此慾望導致與外來者（漢人通事與清朝官員、以及後來的日本官員）不斷的合作，最後完全被日本人控制。

呂家望事件／大庄事件引發清政府從大陸調派大量軍隊鎮壓，包括史上著名的北洋水師丁汝昌率定遠艦從海上砲擊陸地民兵，讓原住民各社首次見識到現代化的強大軍事力量。當達達本人驚嘆清軍軍力的壯盛，經驗

³⁵ 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頁10。

³⁶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158。

³⁷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159。

豐富的張新才卻指出：「清軍對付臺灣民變有絕對的實力，可是碰到日本人，恐怕不是對手。」丁汝昌重挫臺灣民變的定遠艦，在日後的甲午戰爭赫赫有名。張新才說的沒錯，可以鎮壓自己人民的清軍，在甲午戰爭中徹底潰敗，丁汝昌也自殺身亡。小說中的呂家望事件替甲午戰爭與乙未戰爭暖身，小說從此開始鋪陳更多小事件而導向割讓臺灣與乙未戰爭的高潮。本節分析彪馬社歷史上數度與當權者協力，用以壓制其他部落與漢人族群。清朝強大時他們與清朝合作；清朝落敗時他們與日本協力來抵抗清朝。巴代不只是描述複雜的族群關係，也凸顯原住民主體行動的可能性，而非將原住民全然放在被動受害者的位置。

（二）改變東亞秩序的甲午戰爭

本書最後四章鋪陳甲午戰爭前的氛圍、甲午戰爭後被割讓的臺灣，以及臺灣的乙未年風雲。這些眾人熟悉的重大歷史事件，從原住民觀點來敘述，增加許多眾人所不知的細節，也讓此書內容具有世界史的意義。

甲午戰爭前，清朝即使經過鴉片戰爭的失敗與羞辱，在西方列強眼中，仍是東亞的大國與中心，而日本不過是一個小國。甲午戰爭可說是日本演給西方列強觀看的一場戲：³⁸戰爭發生時西方列強並未料到日本會贏得勝利。戰爭結果另西方對日本刮目相看，東亞秩序重整，由中國中心轉成日本中心。爾後日本對中國持續侵略，甚至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更積極的以殖民地臺灣為南進基礎，攻打被英國等西方國家殖民的東南亞。

巴代以精簡的方式提煉複雜的東亞史與世界史，並提出原住民觀點的歷史進程。延續書中的呂家望事件，事件後臺東知州來了一位新上任官員胡傳。³⁹史料記載他為官清廉公正、剛正不阿。從此書觀點，他雖然不貪污，但是以更苛刻嚴峻的態度對待番社。番社頭目被傳喚晉見時，胡傳要求他們下跪，並以跪行方式前進到他面前。面對清廉及勇於任事的新上任官員胡傳，達達更為焦慮，她擔心這種官員反而更會介入番社事務，番社的自主性愈加被削弱。「官員越貪越怕事，越不會管番社的事。怕的是來了一個自以為清廉，又愛胡亂出主意管事的官員，把主意打到番社頭上，擾亂甚至想改變我們。」⁴⁰

³⁸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³⁹ 胡傳字鐵花，胡適之父。

⁴⁰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188。

之後作者以「聽說朝廷跟日本打起來了」⁴¹讓甲午戰爭上場。不論是漢人還是番社，大家都只能「聽說」，謠言滿天飛，臺灣居民卻無法得知事件真相，顯現臺灣邊緣化的處境。甲午戰爭由達達與張新才的對話，將時間軸上的呂家望事件與甲午事件連接，也將原本毫無關連的朝鮮與臺灣在地理空間的橫向軸線連接起來。巴代用簡潔的方式，讓臺灣被引入東亞與世界史，被引領到世界的舞臺（worlding）。⁴²張新才對達達說：

聽說朝廷跟日本打起來了，很多謠言說那是從去年胡傳進駐阿里擺就開始了，臺東州府的官員都閉口不談，但每個人卻憂心忡忡。我這幾回去了枋寮、打狗，也聽了不少零零碎碎的謠傳，說北洋艦隊被日本艦隊給消滅了，連提督丁汝昌都死了。……。妳忘了幾年前，開到臺東海面的大船，直接從海上開砲打呂家望的那些船，據說被日本擊沉了，因此那個提督丁汝昌自殺死了，還聽說清兵在朝鮮也死了幾萬人。⁴³

張新才又繼續：

唉，對付番社，或者地方，朝廷可以動用的資源的確多，但是對付西洋或東洋，那就不一定呢。⁴⁴

達達聽說此消息，要求張新才幫她張羅一支最新式的連發槍，且表示：「我是達達，騎馬的女王，卑南覓獨一無二的女人，不配一把槍，難道要我執長矛啊？」⁴⁵這句話顯示原住民並非只是以傳統（執長矛）來確認自己的主體性，而是與時俱進，在武器上也追求現代化。

⁴¹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19。

⁴² Spivak 提出「引領到世界」（worlding）的概念：原本自足的地方因為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主義而被帶入了帝國主義界定下的世界秩序。參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張君攻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群學，2005），頁 135。就文學而言，史書美也提出文學的在世性（Worldliness），指出文本為世界的存有。參見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頁 2。

⁴³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19。

⁴⁴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20。

⁴⁵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21。

作者敘述張新才納悶「中日之戰與臺灣何干？」⁴⁶顯示臺灣人總是被動地被捲入大事件而又缺乏正確資訊的無奈。番社由三件事判斷情勢不妙。首先是胡傳「匆匆離開」，再來是一些清朝官方兵勇出現於部落，拿槍換取糧食，後來演變為借錢借糧食。到最後則是騷擾番社民家，直接搶奪擄掠。這就是卑南族彪馬社女王陳達達率眾對抗清軍的原因。

史料上記載胡傳及清兵「奮勇抗日」，當代學者重新耙梳史料及當時庶民以口傳歌謠留下的紀錄，顯示胡傳只是被動防守、同時焦急地等待接獲朝廷指示內渡回大陸，並無「奮勇抗日」。⁴⁷劉德杓等持續留在臺灣的清軍殘部也被主流史家視為「奮勇抗日」；相形之下，當代學者指出清軍軍紀敗壞，到乙未年臺灣本土住民（尤其是客家人姜紹祖的義軍）積極抗日時，清軍殘部卻是到處劫掠。⁴⁸

關於達達戰勝歸來受到部落群眾歡迎，巴代只用了四行來描寫。全書最後兩行將出征的情節高潮拉回冷靜的反高潮，只以兩行寫著：

「如果是這樣，我應該有臉見拉赫拉氏族的列祖列宗了吧！」達達收了槍，近乎自言自語的輕聲說，鼻腔一陣酸，而眼眶、視線早已濕糊。⁴⁹

巴代在全書一貫以中性、簡約、精準、不煽情的文字描繪清軍腐敗與彪馬社抗清成功。而早在出發征戰前，達達與其他人就已預知不樂觀的未來：「未來恐怕要天翻地覆的改變，連根都要拔起了」、「一個比大清朝廷更強大的集團勢力出現，未來那將會是怎樣的情況？」⁵⁰巴代透過達達與各種角色，表達底層人民的憂慮。準備抗清與抗清的勝利，只能帶來短暫的激情。激情過後，原住民未來只會受到日本殖民政府更有效率、更徹底的控制。憂慮與淡淡的哀愁，貫穿全書。

⁴⁶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22。

⁴⁷ 胡傳本人日記「臺灣日記與秉啟」顯示甲午戰爭爆發後他就急於離臺內渡，參見陳英傑，〈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臺灣時的心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8 期（2009），頁 249-273。

⁴⁸ 參見戴寶村，〈小民與大變局：臺灣庶民社會對甲午戰爭與割讓之反應〉，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李登輝基金會，2015），頁 240-241。

⁴⁹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63。

⁵⁰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250。

雖然達達率原住民部落迎戰清軍而勝利，歷史終將告訴我們，雙方都走進歷史的灰燼。雖然彪馬社與日軍合作，後來日本殖民政府也頒發賞金給達達，但歷史也告訴我們，不同的原住民族終究是反抗日軍而被殘暴地鎮壓屠殺。⁵¹

無論如何，文本內走入歷史灰燼的原住民，卻在文本外的臺灣社會於日治時期以日文書寫、於國府來臺後以華語書寫，締造原住民的書寫傳統。1980年代與本土化運動同時展開原住民運動、控訴漢人內部殖民的不公不義、展開原住民文化尋根運動，成就了一群原住民作家以華文書寫原住民文化與歷史，讓原住民由黃昏走向黎明。⁵²以羅馬拼音記錄原住民語以及祭典時的禱詞與吟誦，也在作家及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漸累積成果。文本以外的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然後是有名無實、軍閥割據的中華民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爾後發動一系列戰爭（1951年征服西藏、1979年發動中越戰爭），成為現代化的新帝國主義，也讓華語語系的發展有了更繁複的面貌，更促發史書美以華語語系研究來探討清朝與當代中國的帝國主義，以及臺灣的定居型殖民主義。原住民與其他漢人，經歷重層殖民與重層的語文學習（日文與華文），以統治者的語言來書寫對統治者的歸順或反抗。另一方面，漢人內部，也經歷了新舊文學論戰與臺灣話文論爭。臺灣的華語書寫文化，也銘刻著南島語系、閩南語、客語、日語的多音交響。臺灣的多重族群關係不僅顯現在歷史事件上，更在文學表現上以內容、主題、語言形式再現這些族群關係。

（三）女王的表相與真實

「女王」一詞，並非卑南族語言本來就有的詞彙與概念，而是來自漢文化。巴代在小說中如此介紹：

「女王」的稱號並不是彪馬社傳統對女領導人的稱謂。即使第十九代領導人希洛谷是個真正名實相符的女頭目，「女王」甚至「卑南王」這個字也還沒出現在東臺灣。那是隨著漢人增多，才以第十八代領導人進京受犒賞六品頂戴，所形成的「王爺」形象，在漢人間傳開，對彪馬社領導人的習慣稱謂。⁵³

⁵¹ 例如太魯閣之役（1914年）、霧社事件（1930年）。

⁵² 原住民處境之黃昏意象乃孫大川所提出，參見孫大川，〈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1993），頁98。

⁵³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36。

「女王」一詞對應「王爺」。巴代繼續解釋，陳安生身為漢人婚入番社後，藉由強化「女王」頭銜來名正言順地當起實質上的彪馬社「頭目」。因此，「女王」一詞是漢人男性所建構，以女王的配偶身分掌握實權。

卑南族稱領導人「阿雅萬」。巴代在書中大部分時候使用「領導人」這個當代詞彙，少數時候用阿雅萬，而「頭目」一詞則是清朝官方對部落領導人給予的稱呼與「職銜」。由書中看來，西露姑與達達兩位女領導人並未得到清朝承認。陳安生、張新才才是清朝官方對口單位的「頭目」或「土司」。直到現在的臺東縣政府網站所提供的臺東編年史，不見西露姑的名字，反倒出現「卑南王陳安生」的指涉，也有「女傑陳達達」，並無「女王」的稱呼。⁵⁴

番社人口組成的規模從數百人到數千人，如此小型的政治組織，不可能出現一般讀者想像中排場豪華、集所有權力於一身的「皇帝」、「國王」或「女王」。「秘密讀者」就懷著這樣的期望，批評巴代筆下的達達似乎無所作為，而上一任女王西露姑所占篇幅更小。其實，巴代所欲呈現的就是清朝末年漢人如何經由婚入番社而取得實質領導權；但另一方面，女王也非漢人首領與丈夫的傀儡。巴代筆下清朝末年的彪馬社出現雙元領導體制：一邊是漢人林貴，執行各項事務，但都要事先與女王西露姑與丈夫陳安生稟報，並進行實質討論，部落長老也一起加入討論。因此這是合議制的政治體系。西露姑傳位給達達，並安排與漢人張新才結婚。

達達成為領導人後，騎馬巡視彪馬社與鄰近聯盟的諸番社。騎馬對當時的原住民而言，仍是陌生新奇的，因此達達騎馬到各地巡視，以其特殊的外表，發揮了「耀武揚威」的政治效果。

實質上達達作為女王，有何權力呢？平常是部落長老來與達達的漢人丈夫先主導討論重大議題，在討論過程中，達達很少主動發言，而是提出問題讓眾人更深入討論。被別人問到她的看法時，她才表達看法。而此時張新才又繼續發言，將眾人意見導向他一貫地對外關係思考方式：「保持中立、或是與官府合作」。清朝勢力大時就與清軍合作；甲午戰爭日軍勝利，他們就與日人合作。在漢人頭目的領導下，彪馬社的對外關係一直是與官府採取協力關係。本書名為《最後的女王》，呈現出性別關係與族群關係的

⁵⁴ 參見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族群分類與分布〉，網址：<http://www.taitung.gov.tw/Aborigine/cp.aspx?n=AAA85B9492F854A1&s=A6899105950B1EE1>（2017.06.03 徵引）。

交織及其弔詭：漢人藉由婚入彪馬社，反而取得實權，而他的權力，也必須由其妻達達來賦予正當性。

達達最具體的作為是帶領部落戰士與甲午戰爭後在臺的清朝殘軍作戰。此時達達終於有了充分的領導人氣勢。出征時部落舉行盛大的歡送儀式；凱旋歸來時，整個部落歡聲雷動。

書中情節顯示陳安生之於西露姑、張新才之於達達，都很清楚明白要透過打點、裝扮女王外在的氣勢，以此來擴大自己的實質影響力。張新才買馬給達達，達達很感動高興，張新才說：「妳是女王耶，沒把妳打造成真正的女王，我的事業版圖也不可能真正的擴大起來，這是我幫妳，妳幫我。」⁵⁵

書中描繪客家人、呂家望社等族群與清軍交戰的過程，這些細節，彪馬社上上下下沒有人清楚地完全掌握。葛拉勞感嘆：「看來，我們真的完全與這個世界隔離了。」⁵⁶

小說中達達、其夫婿、部落長老等人經常憂心與世界隔離、被邊緣化。如此的擔憂，反而更能顯示彪馬社很早就開始有「世界」的觀念。他們一方面要保持自主，不讓外力介入番社內部；另一方面，又很弔詭地必須屢次與當時的強權者合作，才能確保番社的存在。那麼「世界」又是什麼呢？我們如何從微觀的地方史出發，連結到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許多表面上相隔很遠、看不出關係的現象，是否隱藏在結構之中，有如史書美援引葛里桑（Édouard Glissant）所說「相會於海底」那般，在看不見的基礎上運作？⁵⁷

四、以原住民為方法：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

《最後的女王》一書，不只是對既定的歷史書寫提出「補遺」的作用，而是從原住民出發，啟動我們去觀察多重權力關係在歷史形成過程中複雜的糾葛。李育霖曾提出「以臺灣為方法」⁵⁸，提倡從臺灣內部理解自身，將臺灣視為多重建構與歷史網絡的節點，由臺灣而拋出水平的觀看方式，從將視角從臺灣延伸至全世界。筆者延伸這樣的想法，提出「以原住民為研究方法」。原住民一方面被包括在臺灣之內；另一方面又因為語言屬

⁵⁵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144。

⁵⁶ 巴代，《最後的女王》，頁 162。

⁵⁷ 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頁 6-7。

⁵⁸ 李育霖，〈臺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頁 165-210。

於南島語系，所以又超出臺灣之外。原住民長期位於社會最底層，歷次政權更迭中當權者以其原住民政策來確認統治界線的有效性；因此從原住民出發，可以啟動最具活力的研究進路。此外，史書美提出「關係的比較學」及「世界史」兩個概念，用以說明文學活動與其他活動如政治、經濟等形成動態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⁵⁹並在世界史的架構下運行多重的關係網絡：

定居型殖民主義的目標不是獲取資源和勞動力，而是要取代土著／原住民並使他們消失。……入侵是一個結構，而不是一個事件。定居殖民者不會離開，因此殖民境況永不結束。⁶⁰

關於乙未戰爭的歷史書寫，大都集中在臺灣西部，由苗栗客家庄延伸至彰化等地。臺民自發性組成義勇軍抗日，以原始的武器組成一次又一次的游擊戰，導致日軍在臺灣的死亡人數多過甲午戰爭死亡人數。⁶¹向來被漠視的臺東，卻展開不一樣的戰鬥。清兵殘部到處打家劫舍，彪馬社為了自保，在日本顧問協助下發動雷公火之役而擊退清軍，讓日軍和平進入臺東平原。臺灣西部的義勇軍在抗日時，清軍不但無法相助，反而趁亂打劫，與在東部的行為一樣。當時西部民間傳唱的時局民歌，以及著名文人洪棄生的詩作，都留下清軍由正規軍變成盜匪的紀錄。⁶²

如果從「關係的比較學」來看，臺灣東部原住民彪馬社、清軍、日軍的三角關係，對照臺灣西部義勇軍、清軍、日軍的三角關係，二者有極大不同。彪馬社「以和為貴」，引進日本勢力來對抗變成盜匪的清軍。西部漢人並非不知清軍的腐敗無能，但是他們更關心對抗日軍，不甘心被異族統治。對原住民而言，外來統治者永遠是異族，不管是誰來統治，他們都是關心當下自身番社的基本存活。漢人、日人都他們而言都是異族，因此沒有漢人的棄民悲情。

發生於 1888 年的呂家望事件清軍派兵鎮壓，包括由丁汝昌率領的北洋水師以船艦從海上砲擊陸地。這是原住民第一次見識到現代軍艦，也因而

⁵⁹ 史書美，〈關係的比較學〉，頁 6。

⁶⁰ 史書美，〈理論臺灣初論〉，頁 71。

⁶¹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p. 10.

⁶² 參見戴寶村，〈小民與大變局：臺灣庶民社會對甲午戰爭與割讓之反應〉，頁 240-242。

比西部漢人更早嗅到不尋常的訊息。丁汝昌的軍隊可以輕易打敗臺灣民變，面對甲午戰爭卻完全不是日軍對手。呂家望小規模的民變事件似乎顯示北洋水師的成功，其實這只是表相。不久後日本發動第一次現代化戰爭，這就暴露出北洋水師與清朝軍事制度的落後。Norman 認為，日本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不像是先進工業國——如英國——由輕工業而發展為重工業，日本是基於戰爭需要，以軍事重工業帶動全國的現代化。⁶³換言之，日本的現代化是以發動戰爭為催化劑。

根據學者 Lone 的說法，甲午戰爭是日本第一次現代化戰爭。現代化戰爭意味著國家具有以法律為基礎的全國動員能力，並以外交政策配合軍事行動；⁶⁴另一方面，透過開放各國戰地記者採訪，以報章雜誌報導最新戰況，掀起國內民眾從軍愛國熱潮與國際上對此戰爭的重視。⁶⁵相反地，清朝軍隊不是全國性而是區域性，主要由李鴻章率領的北洋水師迎戰，與其他區域的清軍內鬥頻繁。⁶⁶清朝也缺乏媒體策略，民眾不知戰情發展。巴代數度在小說中寫著「彪馬社不知發生什麼事……」。彪馬社的訊息落後的處境，反而激發其危機意識，感受到清軍與日軍強弱的反差，以及即將進入自身無法掌握的世界。

甲午戰爭發生原因是清朝與日本為了搶奪對韓國的控制權而爆發，結果卻是割讓臺灣，臺灣因為被清朝拋棄而弔詭地被引入世界舞臺。甲午戰爭時韓國趁機宣布獨立，次年乙未年臺灣也成立臺灣民主國。兩種獨立都是早產與早夭兒，缺乏內部成熟的條件而完全是因應外在刺激而催生。此外，甲午戰爭時清廷要求蒙古出兵，事後又要蒙古分攤對日賠款，蒙古轉而與俄國交好，埋下日後蒙古獨立的種子。⁶⁷一場戰爭扭轉了西方對日本的想法，也牽動整個東亞局勢，宣告日本帝國主義登上世界舞臺，與西方帝國主義並列，更預告了日後韓國與臺灣殖民與抵殖民的歷史發展。

⁶³ Herbert E. Norman,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pp. 126-127.

⁶⁴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pp. 4-5.

⁶⁵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p. 98.

⁶⁶ Stewart Lone,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p. 10.

⁶⁷ 參見吳密察，〈甲午戰爭、乙未之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李登輝基金會，2015），頁 19。

若從處於族群階序底層的原住民視角來看，原住民比漢人更早接觸西洋人，啟動番社開放性，以及對外談判協商的能力。發生於牡丹社之前的1867年美籍商船羅妹號於屏東擱淺事件，促使駐廈門美國領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親自來臺與當地大頭目交涉。他所寫的呈美國政府報告書 *Report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其中將原住民形容為老實厚道、信守承諾，與清朝遊宦詩人筆下兇蠻的番人大相逕庭。⁶⁸李仙得在此報告書呈現清朝官員無能治理臺灣番社，建議美國併吞臺灣。他的建議未獲美國政府重視，反而被日本政府看上而成為顧問，日後參與牡丹社事件的談判。當時談判對象是百朗番社領導人潘文杰，他也出現在《最後的女王》一書，引介日本軍事顧問與彪馬社認識，商量與清軍作戰的策略。以往臺灣史以漢人為中心，如今若以原住民為切入點，我們可看到洋人冒險家、商人、最新政權的官員、民變起事者，都必須先拉攏原住民，確保原住民站在他們這邊、或是保持中立。原住民在多族裔的臺灣社會，發揮槓桿功能，以此確保自身弱勢者最基本的生存。臺灣被帶入世界的方式是先由原住民被帶入世界，由冒險家、商人、傳教士、統治者與原住民接觸而留下對臺灣的紀錄。此外，17世紀荷蘭人為了占有福爾摩沙、建立其統治正當性，很弔詭地在「麻州協約」中確立原住民的主權，再經由此協約把主權「讓渡」給荷蘭東印度公司。⁶⁹

五、結論

千禧年來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小說，一般來說都將線性時間切碎，以多重時間的交織來表達歷史的多元發展。《最後的女王》以線性時間的編年史來敘事，用字簡單精確，這種看似平凡的寫作手法，其實需要先消化大量史料並將其統整，使讀者便於閱讀以往較少接觸過的原住民歷史。這些歷史不只是原住民史，更是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呂家望事件時出現的丁汝昌與北洋水師，讓原住民與遙遠的北方中國有了初步聯繫。此後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乙未戰爭都顯示原住民觀點下清朝的腐敗無能。

⁶⁸ 參見陳芷凡，〈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頁329-362。

⁶⁹ 參見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頁99；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臺北：前衛，2004）。

原住民漢語書寫給華語帶來不一樣的語言與文字形式。此書以華語寫成，只有少數幾個卑南族語，讓人覺得巴代漢化太深。其實，在《笛鶴》一書，巴代已進行了大膽的書寫實驗。書中出現大量以羅馬拼音寫成的母語，也有許多漢字表記的臺語。二者都被巴代以標準中文翻譯出來。如此一來，讀者在視覺與聽覺上有突兀感（大量羅馬拼音，以及朗讀出聲才得以明瞭的臺語），無法毫無間斷地閱讀下去。文本具有畫面上與聽覺上的異質感，拓展、挑戰標準中文的漢人視域。經過《笛鶴》的實驗，巴代已證明自己的母語能力與臺語能力，於《最後的女王》又回到一般中文書寫，題材與觀點則負有挑戰性，從地方連結到世界；同時也以平實手法暴露百朗對原住民土地鯨吞蠶食，驗證了史書美所言的「定居型殖民主義」⁷⁰。

彪馬社為求生存而運用靈活的手段處理各種對外關係，似乎也隱喻了臺灣身為小國在國際社會的生存策略。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口傳神話、當代漢語書寫，一方面標示了原住民族相較於漢人的特殊性與差異性。另一方面，臺灣漢人為了區隔臺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也會拿原住民作為差異的符號。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很弔詭地具有普同性，足以代表整體臺灣，對外隱喻臺灣作為一個弱小國家所需的生存策略。臺灣漢人既是東洋與西洋殖民體制的受害者，也是內部原漢關係的加害者。巴代沒有用控訴的語氣來指責百朗，但他平淡寫實的風格，提供我們更多反思空間，思索加害者／被害者的相對關係與共謀關係。華語語系研究的觀點，帶給我們「關係的比較」此種研究方法，讓我們能更深入地體會原住民歷史、文化與文學對理解臺灣所能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⁷⁰ 史書美，〈理論臺灣初論〉，頁 68-70。

引用書目

- 不著撰人，〈以「小說」寫史？——巴代《最後的女王》的小說技術商榷〉，《秘密讀者：輕薄的假象》（2015.09），<http://anonymousreaders.logdown.com/posts/304088>（2017.06.03 徵引）。
- 巴代，《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臺北：麥田，2007）。
- ，《最後的女王》（新北：印刻，2015）。
-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24期（2013），頁1-18。
- ，〈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頁11-37。
- 田敏忠（游霸士·撓給赫），《天狗部落之歌》（臺中：晨星，1995）。
- 田雅各（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臺中：晨星，1987）。
- 史書美，〈理論臺灣初論〉，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臺北：麥田，2016），頁55-94。
- 史書美著，楊露遙譯，〈關係的比較學〉，《中山人文學報》第39期（2015），頁1-19。
- 瓦歷斯·諾幹，〈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去殖民：臺灣原住民文學與社會的初步觀察〉，孫大川主編，《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臺北縣：印刻，2003），頁127-151。
- 吳密察，〈甲午戰爭、乙未之役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李登輝基金會，2015），頁16-82。
- 李育霖，〈臺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臺北：書林，2009），頁165-210。
- 李國祁，〈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內地化的解釋〉，《歷史月刊》第107期（1996），頁58-66。
- 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臺北：臺灣商務，2006）。
-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上卷》（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孫大川，〈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1993），頁97-105。
- 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9期（2003），頁97-115。

- 張耀仁專訪，〈我對文學沒有想像：巴代談《巫旅》〉，《自由時報》（2014.08.18），副刊，<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805492>（2017.06.03 徵引）。
- 陳其南，《傳統制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歷史與人類學探索》（臺北：允晨，1998）。
- 陳芷凡，〈母語與文本解讀的辯證：以魯凱作家奧威尼·卡露斯《野百合之歌》為例〉，《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第6期（2005），頁188-201。
- ，〈漫說恆春太寂寥？——李仙得筆下的番人形象與其族群關係〉，《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頁329-362。
- ，〈「第三空間」的辯證：再探《野百合之歌》與《笛鶴》之後殖民視域〉，《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9期（2014），頁115-144。
- 陳英傑，〈公義與私情：重探胡傳宦遊臺灣時的心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8期（2009），頁249-273。
-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處，〈族群分類與分布〉，<http://www.taitung.gov.tw/Aborigine/cp.aspx?n=AAA85B9492F854A1&s=A6899105950B1EE1>（2017.06.03 徵引）。
- 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臺北：前衛，2004）。
-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二版）》（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
- 戴寶村，〈小民與大變局：臺灣庶民社會對甲午戰爭與割讓之反應〉，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輯，《甲午戰爭·馬關條約與臺灣變局研討會論文集》，頁228-248。
-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玉山社，2017）。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著，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群學，2005）。
- 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Taina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2012.
- Lone, Stewart.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 Mair, Victor. "What is a Chinese Dialect/Topolect: Reflection on Some Key Sino-English Linguistic Terms." *Sino-Platoic Papers* 29 (1991): 1-31.
- Norman, E. Herbert.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Pickering, William Alexander.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pp. 29-48. Leiden: Brill, 2010.

———.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3 (2011): 709-718.

Heteroglossia or Promulgation of Sino-centrism? ——*The Last Queen* and Sinophone Studies

Lin, Fang-Mei*

Abstract

Sinophone studies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versity of the Sinitic languages and the heteroglossia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anguag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who use the term “Sinophone studies” seem to designate Mandarin Chinese a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by which to analyze Sinophone writers across the world, thereby ignoring the tensions and intersectionality created by trans-cultural and trans-linguistic exchang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ltern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esented by indigenous writer Badai in his novel, *The Last Qu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phone studies. This novel describes how the female chieftain Chen Dada of the Puyuma tribe fought against Qing Dynasty soldiers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e book contains multiple interethnic and interracial encounters between indigenous tribes, Han merchants, Qing officials, other neighboring indigenous tribes, and Japanese military advisors. These storylines highligh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apacity for strategic thinking and military mobilization.

With regards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istorians in Taiwan tend to emphasize the concept of resistance - in particular, the Han people’s resistance to the Japanese in 1895. Badai, in contrast, raises the issu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Japanese on the part of the Puyuma tribe during the years 1895 and 1896. The author vividly portrays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s pertaining to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s such, he is able to connect local history with both East Asi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Thus, by examining Badai's *The Last Quee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how Sinophone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place-based 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interacts with non-Sinit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t will also reflect on how indigenous literature enters into dialogue with settler colonialism, while encouraging debate surrounding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aiwan.

Keywords: heteroglossia; placebased cultural production; settler colonialism;
Sinophone studies; *The Last Queen*